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AFTER FREEDOM - FROM

KANT TO MARX



追寻自由

从康德到马克思

韩志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AFTER FREEDOM - FROM KANT TO MARX

追寻自由

从康德到马克思

韩志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自由：从康德到马克思/韩志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0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9150 - 7

I. ①追… II. ①韩…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193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在高清海先生的率领下，超越半个世纪苏式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开展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和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果。韩志伟博士在2004年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追寻自由——从康德到马克思》这部论著丰富了这一理论成果，是一篇学术功底坚实、理论阐述深刻的好著作。这是高清海先生倾心指导和韩志伟博士认真读书而取得的令人欣慰的成果。

高清海先生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看作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教科书那种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理解。高先生说：“哲学理论的意义主要就在于思维方式的意義。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中的原理、结论乃至对许多问题的具体观点在历史激流的冲刷下大都湮灭、淡忘或淘汰，能够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哲学思维曾经发生过的影响。”马克思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哲学家的地位，就在于他把握住了近代以来哲学发展的主体能动的脉搏，继承了康德思维方式的转向，并进而把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能动性变革为现实的实践能动性，创立了以劳动、实践为理论前提的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实现了哲学革命，开辟了实践思维方式的新哲学。在这一变革的逻辑进程中，有两个关节点，一个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颠覆了两千年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根本地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的立场，不再让认识服从对象，主体服从客体，而是让对象围着认识转、让客体围着主体转；另一个关节点是要发现这种思维方式转变的现实根据，发现这种哥白尼式革命的生命基础，康德那种把思维能动



性作为既定事实的理论仍然属于“解释世界”，而一旦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具体思维方法发现劳动、实践这一人的本质活动，那么理论就发生了革命，哲学成为“改变世界”的理论。高清海先生的这一理论思路在国内真正懂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者中获得了真切的认同，“从康德到马克思”的研究成为理解马克思的根本理路。韩志伟博士在对哲学原著下笨工夫，对哲学理论的逻辑进程“笨想”的基础上，睿智地想通了“彻底经过康德是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条必经之路”，于是，“力图在对康德批判哲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重新回溯马克思实践哲学变革的理论前提，深入理解其变革的当代意蕴”就成为本书的主题。

哲学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中既要有基本逻辑、理路、线索的思考，又要有具体细节的扎实研究的功夫。具体的研究是基础，思想的逻辑是结晶，这有些类似于史与论的关系。韩志伟博士在对康德哲学的具体研究和阐述中显现了扎实而又艰苦的基础功夫，作为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一、二、三章分别系统地阐释了康德的先验感性和知性论、先验理性论、实践理性论，第四、五章论述了从康德经黑格尔到马克思的逻辑进程，并简要地论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内涵。本书的内容属于哲学的纯理论，而且又是人类哲学史上最艰深的一段，只有经过若干岁月的寒窗苦读，才能理解康德、黑格尔那被恩格斯称为“迂腐晦涩”的语言和“笨拙枯燥的语句”，但是，一旦人们工夫下到了，理论理解了，看到的将是19世纪德国人那汹涌澎湃的精神世界，而这种精神只有马克思把它引导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光明之路。当然，那种离开了马克思的引导的德国的思维能动精神，经过叔本华和尼采的放大，也曾走向荒谬而给欧洲和人类带来灾难，由此也更加证明马克思实践哲学变革是多么伟大和可贵。相信人们会从韩志伟博士的著作中体会到这人类思想史上最华美的乐章。

高文新

2009年5月于吉林大学东朝阳宿舍



目 录

序言	(1)
导论	(1)
第一章 “自然认识之谜”的破解	(6)
一 “自然认识之谜”	(6)
二 对感性的先验内容的分析	(13)
三 对象性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35)
第二章 纯粹理性界限的厘定	(45)
一 先验辩证幻相的批判	(45)
二 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	(61)
三 在先验辩证论中的辩证法与实践的关系	(77)
第三章 道德形而上学的确立	(84)
一 实践理性批判	(84)
二 在纯粹实践理性中的实践与辩证法的关系	(106)
第四章 现实自由世界的寻求	(117)
一 重新理解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117)
二 判断力批判中的辩证法与实践的关系	(144)
三 人的现实自由世界何以可能?	(154)
第五章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变革	(193)
一 哲学观念的变革	(193)
二 实践哲学的嬗变	(201)
三 辩证批判的展现	(209)
参考文献	(218)
后记	(223)

导 论

马克思实践哲学变革的核心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一变革直接指向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因此，真正立足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反观自审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充分理解这一变革的关键。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这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实践哲学变革的理论前提^①。在某种意义上，继续研究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问题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但是按照哲学问题自身的理论性质来说，一个“老问题”总是与一些“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如何在这种交织中进一步推动这个问题自身的研究就构成了本书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围绕着马克思哲学观念的变革又提出和阐释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比如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问题、马克思实践哲学问题、马克思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更深的层次上阐释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变革的具体内容，预示着这种探讨正在向着更深的学术史层面掘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变革过时了，恰

^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的学者通过批判传统哲学思维方式，阐释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了马克思实践性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具体内容，为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著作（比如，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孙利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

恰相反，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依然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正如高青海老师说过的那样：“哲学理论的意义主要就在于思维方式的意義。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中的原理、结论乃至对许多问题的具体观点在历史激流的冲刷下大都湮没、淡忘或淘汰，能够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哲学思维曾经发生过的影响。”^①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地回溯那些至今还在左右着我们头脑并且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影响的哲学思维方式，才能切实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变革的伟大意义。

康德批判哲学是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看待事物的眼光。以往人们总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看待事物，从此人们开始从主体的或活动的方面看待事物。可以说传统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还处于“前康德”阶段，因为它仍然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看待事物，尚未真正从主体的或活动的方面看待事物。至于说我们应当在彻底经过康德，超越黑格尔，同时又避开倒退回费尔巴哈的意义上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实践哲学，就更无从谈起了^②。因此，我们认为，彻底经过康德是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条必经之路。因为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包括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康德批判哲学中的思维方式，比如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实存性诠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后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都意味着我们要切实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必须把康德这一看待事物的眼光尽收眼底，否则，我们不仅无法最终脱离“前康德”阶段中那种看待事物的眼光，而且也无法消化吸收“后康德”发展中那种看待事物的眼光的转变。所以，本书力图在对康德批判哲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重新回溯马克思实践哲学变革的理论前提，深入理解其变革的当代意蕴。

^① 《高青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② 参阅吴晓明《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第90—100页。



理性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后来的胡塞尔把这一问题概括为认识如何超越自身切中对象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哲学思维而言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难于破解的“自然认识之谜”，整个先验现象学都为之旋转。如果我们回顾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这个问题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了一场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不再让认识围绕着对象旋转，而是让对象围绕着认识旋转，以此来解决理性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我们仍然让认识围绕着对象旋转，那么我们就无法解决先天地认识对象的问题；反之，如果我们“颠倒”这个基本的前提，让对象围绕着认识旋转，那么我们先天地认识对象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我们认识对象的知性规则就已经先天地在我们心中作为前提了，也就是说，对象在先天认识活动中的被给予性问题获得了解决。这样，我们就不再从直观的或客体的方面来看待对象，而是从活动的或主体的方面来看待对象了。但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主体自身的认识活动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勘察，以此来从根本上解决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身的问题。因为随着我们看待事物眼光的彻底转换，认识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当我们考察“对象自身”的时候，也就是在考察“意识自身”，它们始终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此，关于对象的各种构造之间的关系和关于被给予的各种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构成这种考察的具体内容。在这里，我们把关于这些内容的考察方式称之为“对象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内在地包含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但是我们不主张简单地用这种通常的认识模式来替代它，因为在我们看来，后者正是有待仔细考察的一种思维方式。对于这种思维方式而言，我们的对象世界已经不再是现成被给予我们的某种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而是由于我们活动的参与而被构造的现象世界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考察康德对构造对象的各种认识机能及其关系的反思，从中发现他是如何阐释对象世界在先天认识中构造自身的各种普遍



原则，进而在源于纯粹理性自身的这些原则基础上建立对象世界秩序的；另一方面还要分析他关于各种被给予的对象及其关系的反思，从而把握他在“物自身”探究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对象性环节，特别是他在整体对象被给予性的环节中所遭遇到的实践和辩证法问题^①。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多少个对象就有多少种存在方式，因此，这种思维方式围绕着认识与对象的关系所反思到的各种关系是无比微妙、无限丰富的。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之所以是典型的，就在于他围绕着“物自身”揭示了无限丰富的“现象”，即各种关系：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自然认识之谜）、直观与范畴的关系（超越认识之谜）、范畴与理念的关系（世界存在之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性自身之谜）、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性判断力的关系（自在之物之谜）。我们正是通过对这些关键的环节的分析，一方面清理了这种思维方式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揭示了它的本质特性、具体内容、内在矛盾和必然归宿，使从对象性思维方式到实践性思维方式变革这一核心论题落在了实处；另一方面考察了这种思维方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必然陷入的各种先验辩证幻相，展现了在这些幻相中始终贯穿着人的对象性的认识构造活动与人的自主性的实践创造活动之间的内在矛盾，为马克思在实践性思维方式变革的基础上彻底解决理性与自然的关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问题论域。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既反对从抽象的客体或直观方面来看待对象、现实、感性，也反对从抽象的主体或活动方面来看待对象、现实、感性。因为前者是前康德的路子，让认识围绕着对象“转”，而后者是康德以及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路子，让对象围绕着认识“转”，但是，“转来转去”都是围绕着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转”，都是要在“理论上”解决这个关系问

^① 参阅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1页。“对象性”这个概念在胡塞尔那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对象性”是指一切在意识中被构造的东西；另一个方面，“对象性”是指一个整体意识行为所构造的整体对象。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康德所探究的理性自身的一系列“二律背反”看作是对整体对象在认识中的被给予性的揭示。



题，因此，最终都是认识论、知识论的路子，即用一个普遍的原理（这些东西只能是理论反思的产物）来统一对象、现实、感性。马克思不再这么“转来转去”了，他直接回到人的感性活动中，也就是回到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后者是马克思早年手稿中的一个“术语”，意思就是现实的活动）。他认为我们在认识事物之前，就已经通过劳动和事物打交道的了（从这里或多或少看到后来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的某些影子，值得体会）。因此，解决理性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解决在其中产生的一系列对立的问题，都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样一来，哲学的路子就变了，不再是认识论、知识论的路子，而是生存论、存在论的路子了。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已经开始力图在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中消解这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困境，力图在审美游戏和生命活动中寻求出路。特别是通过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哲学反思、自然与自由的关系、现象与本体的关系、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关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等等，在人类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发展为一系列矛盾，成为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形成的新起点。但是，他最终还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和实践活动理解为主观性的活动，仍然让世界本身与其对峙着，而直接颠覆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最终使得历史哲学成为了历史科学。这门伟大的历史科学实现了对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使得人们始终追求自身现实自由的社会历史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康德的历史哲学考察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只要人类还在不断地追求着自己的现实自由世界，那么，这些在不同时代对人类现实社会的批判思想就始终是我们伟大的先导，引领着我们不断地反思和批判我们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现象。



第一章

“自然认识之谜”的破解

一 “自然认识之谜”

认识的可能性对自然思维来说是自明的，但是对哲学思维而言却是有待反思的。因此，当我们反思认识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也就必然走进了与传统形而上学交织在一起的被人们称为“争执无穷的游戏场”的认识论探究中。康德批判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认识论的任务。他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实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让对象与我们的知识一致，而非我们的知识与对象一致的基本假设，其目的首先在于破解“自然认识之谜”，使人们重新反思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进而完成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为未来科学形而上学的建立开辟道路。这一先验哲学的变革无疑是一个无法绕行的“路标”，我们在此停留而非闪避，最终是为向更深处回溯，在根基处探寻这种先验哲学的根苗，从而为大踏步地向实践哲学变革的广阔天地前行开路。

（一）争执无穷的游戏场

在哲学的层面上思考认识与对象的关系，就意味着我们是在由哲学的思维态度所产生的哲学科学中考察这种关系，而非在由自然的思维态度所产生的自然科学中考察这种关系。因此，严格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态度直接关系到我们是在何种层面上思考认识与对象这一关键问题，即是在哲学科学的层面上，还是在自然



科学的层面上考察这种关系。认识的可能性对自然思维来说是自明的、不成问题的。对于这种思维态度而言，认识的现实性永远高于认识的可能性。换言之，认识的现实性是一个永恒的有待实现的问题，而认识的可能性则是一个根本无须思考的问题。因为“自然思维的工作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日新月异的科学是一个发现连着一个发现向前迈进，它根本就不会想到要提出关于认识可能性的问题”。^①与之相反，“随着对认识和对象之间关系的反思的苏醒，出现了深不可测的困难。认识，这个在自然思维中最显而易见的事物一下子变成了神秘的东西”。^②换言之，“认识”对于自然思维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事物，但是对于哲学思维来说则成为令其惊异的东西。正是这种起于惊异的哲学思维态度使认识的可能性高于认识的现实性，使认识的可能性被理解为认识批判所特有的全部问题，使哲学从认识批判开始并且它的一切都植根于认识批判之中。

一旦严格按照哲学的思维态度反思认识与对象的关系，我们同时也就必然踏入了“这些不明确的和充满矛盾的理论的游戏场，以及与此相关的争执无穷的游戏场就是认识论和与它历史而现实地密切交织在一起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任务或理论理性批判的任务首先是一项批判性的任务”^③。正是在这个方面，首先标志着“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的现象学，把“认识和认识对象的现象学”看作现象学的第一的和基本的部分^④。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作为康德先验哲学彻底化的结果，更加彻底地、自觉地在哲学科学的层面上反思认识与对象的关系，因而也就非常明确地、深刻地揭示出我们在反思认识与对象的关系时所遭遇到的“自然认识之谜”，即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有把握“切中”客体这一可能性问题。正是这个谜一般的认识论探究中的基本问题刺激着近代哲学自身的发展。胡塞尔曾说，现象学可以

①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3页。

④ 同上书，第24页。

说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具有令人惊异的深刻性的笛卡尔的基本性思考已迫近现象学；然后它又出现在洛克派的心理主义中；休谟几乎踏上了它的领域，但失之于盲目性。而第一位正确地瞥见它的人是康德，他的最伟大的直观，只有当我们通过艰苦努力对现象学领域的特殊性，获得其清晰认识以后才能充分理解。”^①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掀起的那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这个“争执无穷的游戏场”中重新审视这场哲学革命的真实含义，其目的是为了在思的道路上前行，因为有时回溯恰恰是为了前行。

（二）真正的批判时代

近代认识论在前康德哲学阶段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笛卡尔“我思”所确立的意识界之中。所谓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实质上是在意识界中的“内在性”个别经验观念与“超越性”一般抽象观念的内在矛盾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彻底的经验论者在个别经验观念中否定了抽象实体观念，意识界无非是一束束的感觉观念，经验论最终走向了怀疑主义的道路；而彻底的唯理论者通过观念自身综合统一的能动力量的开掘，以绝对的个体化力量来构造意识界，其独断论的特性充分暴露出来。在“休谟的提示”下，康德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惊醒，面临着超越这种争论的迫切任务，为此他必须寻求“第三条道路”，彻底解决人类理性所陷入的这种困境。“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个门类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它为一些它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些问题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来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们；因为这些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②人类理性所面临的一些既无法摆脱又无力解决的问题，使它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人类理性陷入这种困境并不是它的罪过”^③。因为它尚未揭示出自

①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0页。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③ 同上。



身陷入这种困境的根源。在独断论者的专制统治与怀疑论者的无政府状态的“内战”中，这种导致人类理性自身困境的根源尚在晦暗不明之中，人类理性仍然处于黑暗和矛盾冲突之中。在这个“真正的批判时代”，人类理性自我批判的吁求最终被唤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接过理性自我批判的重任，在纯粹理性自我批判的法庭中揭示出自身深陷困境的根源，为奠基于人类理性之中的形而上学最终走上科学的坦途做好准备。

何谓“纯粹理性批判”？

首先，“纯粹理性批判”指明了批判的真正对象，不是对某些书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在这里，“理性能力”就是“认识能力”，“一般理性能力”是包括感性、知性、判断力和理性（狭义的）在内的一切认识能力。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批判对象似乎是我们所能够支配的，其实不然。自康德以来，人类理性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前行，这一事实并非康德作成。这位思想家不过是响应了那个时代向他提出的任务而已。因此，当我们回到这个“精神的解剖学的课堂”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亲身倾听那个向我们说出自己东西的人类理性自我批判的“吁求”：“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①。换言之，对一般理性能力的考察是着眼于来自纯粹理性自身的纯粹知识，而不是来自经验的经验性知识。这个出发点意味着康德批判理性能力，就是要考察理性是否有能力提供不依赖于任何经验（不管是源于直接经验的知识，还是源于间接经验的知识，最终都是经验性的知识）的纯粹先天知识，以及它在脱离一切经验的条件下能够认识什么、认识多少，其自身认识的有效范围到底有多大。随着这个出发点的确定，批判哲学进一步限定了自己的批判对象，即批判作为产生纯粹先天知识的源泉的所谓“纯粹理性”或理性自身，因此，整个批判从《纯粹理性批判》开始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纯粹理性批判”公布了批判的整个范围，不是就纯粹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理性的某一部分先天知识，而是要就“一切”源自纯粹理性的先天知识来进行批判。纯粹理性是“一个如此完善的统一体”，是一个纯粹先天的完整体系，任何一点不充分的原则的出现，都意味着奠基于这一体系中的完全可靠性的丧失。因此，对其进行批判务必要做到“完整”和“详尽”。康德自信地说：“在这件工作中我把很大的关注放在了详尽性方面了，我敢说，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在这里没有得到解决，或至少为其解决提供了钥匙。”^①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对象性思维方式时，必须严格按照其所系统地揭示的理性自身内的“一切”先天知识的源泉或原理来考察这种思维方式，在其一系列的关节中阐发其系统地解答的由理性的本性提出的“一切”问题。因此，这决定了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考察基本上是沿着它自身的内在理路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竭力避免容易出现的“漏听”现象，努力在它自身所敞开的视阈中理解和解释这一思维方式的来龙去脉，真正把握到先验反思的精确意义。

最后，“纯粹理性批判”陈述了批判的最终目的，在探测到了纯粹理性能力（广义的）的一切界限的基础上，依据源于纯粹理性自身“原则”，“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②，以便为一门“作为科学的未来的形而上学”提供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康德所完成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与形而上学这一唯一的主题相关的，仅仅在认识论的框架中理解和解释这场哲学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为总体的形而上学奠基，就是揭示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③。这的确是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真正意义。但是，为完成这个总体的形而上学奠基工作，首先就要“清理和平整全部杂草丛生的基地”，而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纯粹理性批判”的肩上。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 同上。

③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0页。



（三）哥白尼式的革命

众所周知，康德所实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让认识的对象与知识一致，而非让知识与认识的对象一致，由此重新理解和解释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这是反思认识与对象关系视角的一次根本性的“颠倒”。这直接源于哲学要模仿自然科学走上科学道路的决心。在康德看来，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已经踏上科学的阳光大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究其原因是它们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自从这两门理论的理性知识先天地规定其对象以来，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获得了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又始终不断增长着的纯粹先天综合知识。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在从事哲学批判的时候必须面对的科学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范例，也许应予以充分注意，以便对这两门科学赖以获得那么多好处的思维方式变革的基本要点加以深思，并在这里至少尝试着就这两门科学作为理性知识可与形而上学相类比而言对它们加以模仿”^①。在我们的一切知识与对象一致的前提下，我们先天地认识对象的问题就无法获得解决。当务之急我们应模仿自然科学所实现的思维方式的变革，“颠倒”我们考察知识的前提，在对象都必须依照我们的一切知识的假定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就直观认识问题而言，如果我们的直观认识活动围绕着直观对象旋转，那么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我们是无法先天认识对象的。反之，如果我们直观的对象与我们的直观认识能力一致，那么，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我们就已经先天地认识对象了，因为正是我们自身所具备的先天感性直观能力的存在，才使我们最终形成了感性直观的对象。这样，我们就解决了我们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确立了认识中心理论，不再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去理解对象，而是从主体的或活动的方面去理解，康德提出的这一理解方式，为发展后来马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